

閩南頭家的命名學

——「官」與「舍」的意義、用法、詞源

簡 宏 逸^{*}

摘 要

翻閱東亞各地在十七、十八世紀留下的海洋史史料時，經常會遇到冠以「官」、「舍」等詞綴的人名，它們與當時縱橫東亞海域的閩南海商密切有關，是非常有福建和閩南語特色的標誌。但是這些人名詞綴的意義、用法、詞源，仍是尚未徹底解明的問題。本研究先從批判目前被普遍引用的理論下手，梳理此說法從明代中葉至二十世紀初的學術脈絡，並指出既有理論的疑點以及與常理不合之處。筆者認為，梁嘉彬提出的證據僅是缺乏歷史根據的傳說，無法和史料互相檢證，更不可能解釋「官」和「舍」這兩個頭銜的使用，反而是清代《廈門志》與《廈英大辭典》所記的用法較為正確，並且可以和閩南語戲文、臺灣的古契字、廣東行商的名號、巴達維亞華人史料互相印證。至於「官」與「舍」的詞源，則分別可上溯至宋代的身分制度和太學三舍法，本研究將以歷代史料說明之。

關鍵詞：稱謂頭銜詞綴、官、舍、洋行商名、詞源學、大福佬文化圈

2015 年 5 月 4 日收稿，2016 年 3 月 4 日修訂完成，2016 年 7 月 22 日通過刊登。

^{*} 作者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博士候選人。

一、前言

「官」與「舍」是東亞海洋史研究中常見的人名詞綴，令人難以忽略，但也令人充滿疑惑。從中國廣州洋行商人到臺灣各地的地主頭家；從日本長崎的唐通事到印尼雅加達吧國公堂的歷代甲必丹（kapitein）、雷珍蘭（luitenant）；在婚姻登記上，在題捐誌記的寺廟石碑上，我們總會看到許多被稱為某官某舍的人物出現在其中。與上述地方交通互動所留下的西方文獻中，這些頭銜也以 qua、gua、sia、çia 等拼寫出現在檔案中。「官」與「舍」分布的地理範圍廣大，涉及研究主題眾多，但是這兩個詞綴對現代人來說已經是陌生的歷史用法，只能從文脈模糊地讀出它們和英語的 Esquire、Sir、Lord 等頭銜一樣表示某種程度的身分地位。因此「官」與「舍」成為近代以降，不同研究領域的學者處理相關史料時，必須加以解釋說明的特殊詞彙。但是當梁嘉彬在 1930 年代研究廣東十三行，開始對「官」與「舍」這兩個頭銜做比較深入的研究時，這兩個詞已逐漸從學者能親自觀察、掌握的範圍內淡出，學者只能從有限的史料和地方風俗的觀察中捕捉其遺緒。經過數十年各領域間緩步的交流和史料發掘，從梁嘉彬以降就被引用的清初《天祿識餘》所記載的「戶等說」，近年已經與《廈門志》〈風俗記〉「呼公子、公孫曰舍，呼有體面者曰官」的解釋整合在一起，成為解釋「官」與「舍」的標準註解。¹

這個標準註解並不完美。《廈門志》對「官」與「舍」的解釋雖然貼切，但過於簡略，無法解答被冠以「官」或「舍」的人在社會上的具體地位為何。

1 例如吧國公堂《公案簿》第 2 輯對甲必丹「鄭甲解官」的註解便全抄《廈門志》和《天祿識餘》的解釋。袁冰凌、（法）蘇爾夢（Claudine Salmon）校注，《公案簿》第 2 輯（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4），頁 2。媽腰（又作「瑪腰」，majoer）、甲必丹（kapitein）、雷珍蘭（luitenant）皆為荷蘭語音譯官銜，原意分別為少校、上尉、中尉。1619 年荷蘭東印度公司於巴達維亞設甲必丹一職作為管理當地華人之長，此後在其他各地亦有設置。在巴達維亞，1678 年始於甲必丹之下設雷珍蘭作為輔佐，1837 年荷蘭東印度殖民政府再加授甲必丹陳永元媽腰銜，使巴達維亞華人社群之長從甲必丹變為媽腰。參見聶德寧、侯貞平、（荷）包樂史（Leonard Blussé）、吳鳳斌校注，《公案簿》第 3 輯（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4），頁 336、346、350。

而且在《廈門志》的說明中也看不出來「官」與「舍」是一個位階次序中的兩個等級，無法呼應「戶等說」的解釋。事實上，只要對「戶等說」做簡單的歷史考證，就會發現「戶等說」缺乏其他史料支持，而且與一般人避免被編為上等戶籍以避開過重賦役的普遍心態不合。將《廈門志》的解釋和「戶等說」放在一起說明「官」與「舍」的用法與詞源的標準註解，其實是不加考證史料即行拼湊的大雜燴，不足以解釋問題。因此，「官」與「舍」的用法與詞源，仍然是東亞海洋史尚未徹底解明的公案。

但是《廈門志》已經提醒我們，用「官」與「舍」稱呼人是福建風俗，東亞各地史料中某官、某舍的出現也與十七、十八世紀縱橫東亞海域的閩南海商與移民密切相關。這提供一個選擇語料和史料的有效界線，讓「官」與「舍」的研究限定在歷史文化脈絡清楚的大福佬文化圈內。² 本研究將從古代閩南語語料中找到解釋「官」與「舍」詞源的線索，再以閩南海商在東亞各處留下的紀錄檢證之。對於可能詞源的考掘，也盡可能要在大福佬文化圈（the Greater-Hokkien cultural sphere）的歷史脈絡中進行。因此在進行新的研究之前，必須先仔細考證既有標準註解的問題。值得注意的是，現有標準註解的源頭不是與閩南直接相關的研究，而是對鴉片戰爭前廣州洋行商人的研究。可是早期研究未能意識到「官」與「舍」和大福佬文化圈的關係，加上未考證史料信度即行組合，其結果不只是未能成功復原「官」與「舍」的意義，反而進一步產生有問題的歷史解釋。這更顯得本研究在大福佬文化圈的歷史脈絡中考證「官」與「舍」，有其重要性與迫切性。

二、問題始自廣州洋行商人的頭銜

二十世紀以降的學術研究中，1926 年 Hosea Ballou Morse 在 *The*

2 「大福佬文化圈」為翁佳音用來探討臺灣在近代初期社會文化史的研究概念，其原型來自荷蘭史家 Pieter Geyl 提出的 *Groot-Nederlandse cultuurgemeenschap*，主張打破政治劃定的國族疆界，改以語言文化的社群為研究的主體範疇。透過「大福佬文化圈」的概念，我們可以將臺灣與閩南、潮州、東南亞閩南社群放在同一個研究框架下討論，補足「臺灣史」、「華僑史」、「中西交通史」等既有研究領域無法徹底處理的議題。翁佳音，〈「牽手 *khan-chhiu*」來看臺灣世界史：從臺灣歷史慣用語論大福佬文化圈概念〉，《臺灣史研究》13.2(2006.12): 21-25。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中提及 Suqua als. Cumshaw (譯：壽官，又名 Cumshaw)，首次觸及「官」與「舍」的議題。Morse 指出 Cumshaw 意為「乞丐」(bakhshish)，Suqua 過去有這個名字，讓人覺得他只是容易被忽略的小商人，之後冠上「官」改稱 Suqua，顯示這位小商人在商場上已經升級到比較受敬重的地位。這位 Suqua 正是人稱陳壽官的陳廷鳳，1720 年代廣州公行制度初建時，他是在商場上最有勢力的商人，在歐洲檔案上除了 Suqua，還有 Tansoequa、Seuqua、Soukquoi 等拼寫。不過 Morse 還提出另一個可能，也就是 Cumshaw 可能是「金少爺」(原文：Kin Shaoyeh = Young Master Kin；粵語：gam-siu-je；³ 閩南語：kim-siàu-iâ) 的譯寫。⁴ 如果將 Cumshaw 解為「金少爺」，則 Suqua 就不一定是比 Cumshaw 更受人敬重的稱號。Suqua 和 Cumshaw 之間可能沒有地位的差距，也可能 Cumshaw 比 Suqua 高級。總之，Morse 沒有在短短的註腳中為此問題下定論。

第二位嘗試解釋「官」與「舍」的學者是梁嘉彬，他在 1937 年出版的廣州貿易研究的代表作《廣東十三行考》中，把前述 Cumshaw 的-shaw 解讀為「秀」(粵語：sau；閩南語：siù)，認為廣東洋行商人透過捐納得到「官」或「秀」的頭銜，並引用南宋獎勵綱首招商的史料支持，說明商人透過捐納得到頭銜的制度在南宋時就已經實行。⁵ 這個說法可謂「捐納說」。近年范岱克 (Paul A. Van Dyke) 也以洋行商人捐納官職來解釋洋行商人的名號中冠以「官」的現象，並進一步說明捐納後的官銜有利洋行商人的商業操作，也可以在他們不幸遇到法律事件時，提供較大的緩衝餘地。種種好處都有利於執行行商的業務。⁶ 但「官」這個頭銜也廣泛分布於海外華僑社會，那裡無官可捐，「捐納說」便無法解釋海外冠以「官」的人名。可見捐官的行為與「某官」的名號雖然可能出現在同一個人身上，但彼此沒有因果關係。

但是梁嘉彬對於「捐納說」，卻還有不同於一般常識的解釋。他認為洋行

3 本文引用粵語音之拼音，因筆者未熟相關正書法 (orthography)，故暫不標聲調。

4 H. B.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Oxford, UK: The Clarendon Press, 1926), p. 156.

5 梁嘉彬，《廣東十三行考》(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頁 39。

6 Paul A. Van Dyke, *Merchants of Canton and Macao: Politics and Strategie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Trad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13-14.

商人捐納所得的頭銜就是「官」與「秀」，但「官」與「秀」的意義不明，所以他在註 30 引用四份史料加以說明之。⁷ 這四份史料中，除了引自朱紱《金聲玉振集》的資料說明海商有以「某官」為名者，其他三條都指出「官」與「秀」之間有等第之別。其中第一份來自約十六世紀末的田藝衡《留青日札》〈沈萬三秀〉：

今人言富者必曰沈萬三秀云。蓋元末人也沈姓，萬三行。秀者，元時稱人以郎官秀為等第，至今人之鄙人曰「不郎不秀」，是言「不高不下」也。⁸

田藝衡指出元代時對人的稱呼有等第之分，自低至高為「郎、官、秀」，所以富戶沈萬三被稱作「沈萬三秀」，而罵人平庸、成就不上不下則稱「不郎不秀」。在此還沒有出現賦役上分戶等的說法。另一份來自清初高士奇《天祿識餘》的資料，同樣也是為了解釋沈萬三的稱號「萬戶三秀」，但高士奇在此指出洪武年間將每縣家戶分為五等，比一百多年前的田藝衡《留青日札》多了兩等：

洪武初，每縣分人為哥、畸、郎、官、秀五等，家給戶由一紙。哥最下，秀最上，每等中又各有等。鉅富者謂之萬戶三秀，如沈萬三秀乃秀之三者。⁹

高士奇提出的「戶等說」，後來成為許多研究者註解「官」和「秀」時的引用材料。但是高士奇所說「哥最下，秀最上」，在梁嘉彬引用的清人張公泰《粵游小志》中卻稱秀最下，哥最上，是完全相反的說法。梁嘉彬對這兩條互相矛盾的史料多少抱持懷疑的態度，所以都標上問號以示存疑。但是梁嘉彬顯然同意張公泰所說「潮俗，秀才最尊，其兄弟輩則稱大秀、二秀」的說法。在註 31，梁嘉彬引伸張公泰的說法，進一步指出「秀」後來訛誤成「少」，並且認為「少」就是「少爺」的簡稱，所以前述 Morse 提及的 Suqua als.

7 梁嘉彬，《廣東十三行考》，頁 55。

8 明·田藝衡，《留青日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頁 1107。

9 清·高士奇，《天祿識餘》（《叢書集成續編》第 215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說鈴本，1989），卷下，頁 52。

Cumshaw 就是「金秀（少）」。¹⁰

透過宣稱「秀」訛誤成「少」，以及認定 Cumshaw 的-shaw 就是「少」，梁嘉彬把十六世紀開始流傳發展的「戶等說」與 Morse 推測的「金少爺」連結在一起。這暗示商人的稱號和「公侯伯子男」的爵位一樣是五等位階，從最低戶等的「哥」，變成「官」，再變成最高戶等的「秀」，是商人社會地位晉升的過程。這個基於戶等說的論點，梁嘉彬沒有在《廣東十三行考》中明文寫出來，但仍然影響到後來研究廣州貿易的學者。例如張榮祥（Cheong Weng Eang）在 *Hong Merchants of Canton* 中把梁嘉彬已經提出的線索進一步發展，主張前文提及的陳廷鳳最早以 Emuy Kimco（廈門金哥）之名被載入英國檔案，後來改稱 Cumshaw（金秀或金少），再改稱 Seuqua（壽官），這顯示他的社會地位隨著年資和在廣州貿易的重要性而上升，最終得到「官」這個稱呼。¹¹

但張榮祥的說法被范岱克質疑，他指出西文檔案中-shaw 這個音節所對應的漢字是「舍」，例如 Ynshaw 對應到「（顏）瑛舍」，而非梁嘉彬推測的「秀」或「少」。先用「秀」或「少」再用「官」亦不合梁嘉彬引高士奇「哥最下，秀最上」的說法。因此，范岱克認為 Cumshaw 是外國人給陳廷鳳的名字，就像外國人稱 1734 年與顏德舍合夥開設泰和行的黃錫滿（Sikmuhn）為 Simmon 一樣，是歐洲人給廣州行商的洋名。¹²

在此先把現代學者的意見暫時放在一邊，我們應該看看廣州貿易所使用的廣東番話（Chinese Pidgin English）如何說明 Morse 所說 Cumshaw 為「乞丐」之義。在廣東番話中 cumshaw 的意思接近「謝謝」，是乞丐行乞時的用語。*The Chinese Repository* 中有一個語例“cunshaw, taipan”（感謝，大班），正是路邊乞丐叫化時說的話。¹³ 1835 年出版的《紅毛通用番話》中，「乞兒」叫做「今沙文（gam saa mahn）」，很可能就是廣東番話 cumshaw man 的音

10 梁嘉彬，《廣東十三行考》，頁 55。

11 Cheong Weng Eang, *Hong Merchants of Canton: Chinese Merchants in Sino-Western Trade, 1684-1798* (Surrey: Curzon, 1997), p. 134.

12 Paul A. Van Dyke, *Merchants of Canton and Macao*, p. 312.

13 “Jargon Spoken at Canton,” *The Chinese Repository* 4 (1836.1): 434.

譯。¹⁴ 現在研究廣東番話的學者通常認為 cumshaw 的詞源是閩南語的「感謝 (kám-siā)」, gam saa 和 kám-siā 的發音亦可對應, 故此說可信。由以上語音證據推斷, 陳廷鳳的名字 Cumshaw 的讀音應該也和 kám-siā 相去不遠。但這不是他自己選的名字, 而是洋人給他的渾名。可能是陳廷鳳剛進入商場時地位仍低, 所以被給了這個名字, 但隨著他在貿易上的地位逐漸重要, 陳廷鳳才改用「陳壽官」這個比較體面的稱號。這意味著陳廷鳳一生都沒有使用過「秀」、「少」、「舍」的稱號, 而是和大部分在廣州活動的洋行商人一樣使用「官」。如果我們再進一步檢查范岱克蒐羅歐美檔案館所整理出的廣州洋行商人的交易紀錄 (schedules), 以及根據這些檔案所做的人名考證, 可以發現梁嘉彬引用明清筆記史料推測出的「秀」、「少」這兩個頭銜, 根本不曾出現在廣州貿易中; 「秀」訛為「少」, 「少」被轉寫成-shaw 的假說也沒有證據支持。能夠與西方檔案史料互相驗證的頭銜只有「官」與「舍」, 可是梁嘉彬的註解完全沒有提到「舍」, 其意義仍是廣州洋行商人研究中有待解答的議題。

「戶等說」指出的「哥畸郎官秀」五等名號中沒有「舍」, 被認為最高等的「秀」又已被以上討論排除, 只有「官」是實際被廣州行商使用的頭銜。但我們還要追問, 廣州行商使用的頭銜的「官」, 是否真的是《天祿識餘》所說「哥畸郎官秀」五等定制的其中之一? 根據《大明會典》記載, 明初的確有造黃冊以定賦役之事, 第一次在洪武十八年, 「令有司第民戶上中下三等為賦役冊貯於廳事。凡遇徭役, 取驗以革吏弊」。¹⁵ 但明初雖然有分戶等之事, 分等卻是三等而非五等, 對各等人戶的稱呼也一貫以上戶、中戶、下戶稱之。樂成顯研究現存的明代黃冊底籍, 裡面也只看到「上戶、中戶、下戶」三等戶等, 與《大明會典》的規定一致。¹⁶ 總之, 在明代史料上我們看不到清初高士奇所稱「洪武定制, 每縣分戶為五等, 曰哥、畸、郎、官、秀」的現象。繼續往前追溯至戶等制發達的宋代, 在宋代依戶等決定賦役的制度下, 人民為了避免重賦勞役, 傾向以化整為零的方式降低被編入的戶等, 此即宋代所

14 Kingsley Bolton, *Chinese Englishes: A Sociolinguistic Histor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279.

15 明·李東陽等撰, 申時行等修, 《大明會典》(臺北: 新文豐出版公司, 景印萬曆刊本, 1976), 卷 20, 頁 2。

16 樂成顯, 《明代黃冊研究》(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8), 頁 181-185。

謂的「詭名挾戶」。¹⁷ 由此現象可知，上等戶並不是值得追求的地位，又怎麼會有人樂於在名字冠上代表上等戶的稱號，公開招搖呢？

其實比較十七世紀末高士奇《天祿識餘》與十六世紀末田藝衡《留青日札》對元末明初富戶「沈萬三秀」的「秀」所做的解釋，會發現田藝衡對同一件事的解釋比高士奇少了「哥」和「畸」兩等，分等第的時間點也不一致。這顯示田藝衡和高士奇兩人所記錄之戶等說的兩種版本，反映的僅是沈萬三秀傳說的註腳在十六和十七世紀間不同階段的面貌，或純粹是兩個稍異的版本，而且兩者的內容都沒有史料支持。因為「戶等說」的「哥畸郎官秀」已被證明不存在，梁嘉彬引用的「戶等說」自然也不能用來解釋「官」的意義。檢討至此，我們可說《廣東十三行考》中對「官」、「少」、「秀」的註解，其實完全沒有解決問題。還需要從其他資料來解明「官」與「舍」的意義與詞源，而最好的資料就來自大福佬文化圈內，位在十六世紀以來著名貿易地點漳州河口（de revier van Chincheo）的海港廈門。

三、大福佬文化圈內的在地解釋

梁嘉彬在撰寫《廣東十三行考》的時候，並非完全不知道「官」可能是來自福建的人稱頭銜，因為他在序篇便提到法國漢學家 Henri Cordier 所指出「官」在福建為人名常見的普通稱呼。¹⁸ 梁嘉彬認為 Cordier 此說過於武斷，認為十三行商人雖然不少家原籍福建，但是：

「官」字原屬尊稱之辭，中國自元明以後，凡豪富之家以金捐官爵者，人多稱之為某「官」，而行商原為欽准性質，有專攬對外貿易特權，其人本稱「官商」(The Mandarin's Merchants)，其行則稱「官行」(Kwang Hong)，初與福建之稱謂無關；且行商中大都獲有職銜者也。¹⁹

梁嘉彬拒絕 Cordier 的見解，恐怕是受到自己所制定的研究範圍所限，以致忽略廣州行商擁有的「官」與「舍」頭銜，其實是在更大範圍文化現象

17 王曾瑜，〈宋代的詭名挾戶（上）〉，《社會科學研究》（成都）1986.4(1986.8): 77-78。

18 Henri Cordier, "Les marchands hanistes de Canton," *T'oung-pao*, 2nd series, 3.5: 311.

19 梁嘉彬，《廣東十三行考》，頁 3-4。

中的一端而已。現在，我們以後見之明，掌握更多「官」與「舍」的相關史料，而這些史料又都指出十七、十八世紀縱橫東亞海域的閩南海商是將「官」與「舍」帶到東亞海域各港口與漢人殖民地的主要因素，所以在巴達維亞（Batavia，今印尼首都雅加達）、新加坡、²⁰ 檳榔嶼、馬尼拉等地的華人碑銘和檔案中，多有「官」與「舍」的蹤跡。例如在長崎的日本學者透過唐船貿易採集到的漢人民俗資料《清俗紀聞》中，也提到江南、浙江稱人「某相公」，若捐納買官者稱「某爺」，福建稱「一官、二官」，山東和徽州稱「某朝奉」等，都是對人的敬稱。²¹ 類似的資料亦見於〈崎港聞見錄〉，記錄者還仔細區分福建之內的差異：漳州泉州稱「某某官」，福州稱「某某使」。²² 但是出身福州的王振忠也指出福州歌謠中「某官」也是常見的稱呼，而且「當代福州人 70 歲以上（按：王文作於 1997 年底至 1999 年間）叫『某官』的人比較普遍，五六十歲的人尚有不少，此後呈銳減趨勢」。²³

以上略舉衆多證據之一端，即知早期 Henri Cordier 的見解與目前認為「官」與「舍」是閩人風俗的看法無誤。因此要探究「官」與「舍」的意義與用法，應該從記載福建風俗的在地史料下手。在各種史料中，本文緒論中已經提及的 1839 年《廈門志》〈風俗記〉對「官」與「舍」有簡短且準確的說明：

閩俗呼人曰「郎」，呼公子、公孫曰「舍」，呼有體面者曰「官」（訛「官」為「觀」，遂多以「觀」為名者），朋友相稱曰「老」；廈俗亦然。²⁴

這則史料對「官」和「舍」的用法做了簡單的描述，卻沒有舉出明確的

20 陳荊和和陳育崧在《新加坡華文碑銘集錄》的〈緒言〉中簡單地討論了幾個閩南語對人稱謂的問題，但未有結論。陳荊和、陳育崧編著，《新加坡華文碑銘集錄》（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70），頁 23。

21 （日）中川忠英著，孫伯醇、（日）村松一彌編，《清俗紀聞》（東京：平凡社，影印寬政年間刻本，1982），卷 2，頁 46。

22 參見於古典研究會編，（日）長澤規矩也解題，《唐話辭書類集》第 4 集（東京：汲古書院，1971），〈崎港聞見錄〉，頁 483。

23 王振忠，〈契兄、契弟、契友、契父、契子——《孫八救人得福》的歷史民俗背景解讀〉，《漢學研究》18.1(2000.6): 174。

24 清·周凱，《廈門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95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1839 年原刊），頁 649。

使用例，也沒有指出字源。雖然在註解出現這兩個人名詞綴的史料時還可派上用場，就像現在這段文字作為「官」與「舍」的標準註解在史料註腳中扮演的角色一樣。但對於研究「官」與「舍」的意義與詞源來說，《廈門志》的情報仍然不夠具體。像是「公子、公孫」到底是何種身分地位？如何能稱「體面」之人？這些都是《廈門志》沒有交代的空白，所以還需要從更多的資料來捕捉「官」與「舍」的意義。以下的討論將先從「官」開始。

四、官：對外人與對親屬的通用稱呼

蘇格蘭傳教士杜嘉德（Carstairs Douglas）於 1873 年出版的《廈英大辭典》，對「官」（koaⁿ）一字作如下解釋（底線為筆者所加）：

koaⁿ a mandarin; mandarin rank or office; belonging to government; public; affix to some names of relationships and superiors; respectful affix to names of women.²⁵

在此「官」的解釋並沒有比《廈門志》更多，因為此處的釋義應該是從後文所列出各種以「官」結尾的稱謂語歸納而來：「官」作為頭銜的情況，《廈英大辭典》僅錄對女性的尊稱。1923 年巴克禮的《增補廈英大辭典》對「官」作為頭銜的用法有更明確的語例，像是以尊貴的頭銜恭維的套語 a-koaⁿ a-sià（阿官阿舍），以及用 a-koaⁿ（阿官）稱呼 su-iâ（師爺）的兒子。²⁶

從戲曲文獻可以更生動描寫「官」如何在口語中使用。在現存最早閩南語白話文獻明嘉靖刊本《荔鏡記》中有許多例子。例如第九齣〈林郎托媒〉中，反派角色潮州富戶林大與媒人李婆的對話中，李婆稱林大為「林大官」（底線為筆者所加）：

（丑上）彩樓好景致，滿街是貴氣。殘月更鼓催，雞聲啼。天光但得返去

25 Carstairs Douglas,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f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With the Principal Variations of the Chang-chew and Chin-chew Dialects* (London: Trubner & Co., 1873), p. 234.

26 Thomas Barclay, *Supplement to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f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23), p. 113.

厝，再俾卜得桃是來年。

(丑) 天日啞，是誰人？

(淨) 是林大爹。

(丑) 林大官，你三更半冥佐鬼驚人。²⁷

林大自稱「林大爹」，可能是用來描寫林大為人跋扈的筆法。明清用「爹」或「爺」稱呼的對象通常是有權勢之人，如官員或豪富，但通常不用來自稱。²⁸ 正常的用法如嘉靖刊本《荔鏡記》第三十二齣〈赤水收租〉，認出官家子弟陳三的佃戶尊稱他為「泉州三爹」和「泉州三機宜」；²⁹ 之後在知州面前，林大、陳三、五娘都喚知州「老爹」。³⁰ 林大狂妄地自稱「林大爹」，也難怪李婆罵「林大官，你三更半冥佐鬼驚人」了。從李婆用「林大官」稱呼林大，可說明「官」是用于他稱的頭銜。以林大的背景，或可視為對地方財主的敬稱。這與前引《廈門志》「呼有體面者曰官」和兩本廈英辭典的釋義可以互相印證。同樣的用法也出現在萬曆刊本《蘇六娘》中，媒人西蘆林婆稱委託說媒之郭家的長子郭繼春為「郭一官」，³¹ 對照地位相仿且對郭繼春有私情的蘇六娘稱郭繼春為「郭一兄」，顯示「一官」是對外較為正式的敬稱。³²

值得注意的是，萬曆刊本《蘇六娘》中，郭繼春之母在謝過林婆時也稱自己的孩子「郭一官」，但是以敬稱提及自家晚輩看似有違常理。³³ 其實這是因為「官」在閩南語中除了是對他人的敬稱，也可用來指稱家人。³⁴ 出身漳

27 吳守禮校註，《明嘉靖刊荔鏡記戲文校理》（臺北：從宜工作室，2001），頁 45。

28 「爹」或「爺」的用法，以及當時使用這兩個頭銜所造成的身分感，可參考岸本美緒運用明清筆記和小說所作的分析。（日）岸本美緒，〈明清時代の身分感覺〉，收錄於《風俗と時代観：明清史論集 1》（東京：研文出版，2012），頁 157-158。

29 同上註，頁 144。「機宜」為「機宜文字」的簡稱。宋代各路帥臣常以自家子弟擔任機宜文字，信任之外，也可增加年輕子弟的經歷。翁建道，〈北宋機宜文字官初探〉，《史學彙刊》24(2009.12): 10-13。

30 （日）岸本美緒，〈明清時代の身分感覺〉，頁 157、167。

31 吳守禮校註，《明萬曆刊蘇六娘戲文校理》（臺北：從宜工作室，2002），頁 4、6、8-9、12-13。

32 同上註，頁 10。

33 同上註，頁 14。

34 鄭芝龍又名「一官」是類似的例子，這是他的小字或小名，也是他稱霸海上時所用的名號。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輯，《鄭氏關係文書》（《臺灣文獻叢刊》第 69 種，臺北：

州的學者黃典權（1927-1992）³⁵ 以他得自長輩的知識，指出閩南語中長輩稱有親戚關係的晚輩為「官」，夫家稱已婚女性為「官」，妻家長輩稱已婚男子為 koaⁿ，音同「道觀」的「觀」，這是黃典權認為造成「官」與「觀」在人稱頭銜中通用的原因。³⁶ 不過除了長輩對晚輩親戚的用法以外，黃典權指出的另外兩種用法都無法與前引《荔鏡記》和《蘇六娘》中的用法相印證。因為林大與郭繼春在戲中都是未婚即被媒人稱「林大官」與「郭一官」。或許黃典權的說法應該理解為，兩家因婚姻而有親戚關係後，彼此就可以用稱呼家人的「官」來互稱，僅以聲調差異來區別對男子與對女子之用法。

親屬關係範疇內的「官」，在福建風俗中還有男同性戀的意思。《萬曆野獲編》〈契兄弟〉的紀錄說「閩人酷重男色，無論貴賤妍媸，各以其類相結，長者為契兄，少者為契弟」，海上豪酋則因為女性不得上船的禁忌，「以男寵代之，而酋豪則遂稱契父」。³⁷ 福州方言亦有稱「契弟」³⁸ 為「小官」的說法。王振忠據此推論福建海商（被稱為「某官」）在海上貿易中帶男寵出海自娛，這些男寵與海商為契父子關係，所以男寵亦可被稱為「小官」。福州方言中「契弟」帶有貶意，可能與主流文化對同性戀的歧視有關。³⁹ 但我們也不能看到「官」就與同性戀聯結在一起，畢竟巴達維亞的婚姻登記簿上也有許多以「官／觀」為名的男子，這些名字是以傳統價值男女婚配的關係被登記下來，不能視為同性戀關係。⁴⁰ 契子或契弟稱「官」，應視為次文化挪用主流文化親屬關係既有詞彙的結果，是擬制血緣形成的親屬關係，才讓契子契弟被稱作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頁 36。但是荷蘭檔案中將「一官」譯寫為 Equan 或 Iquan，「官」作文讀音 koan 而非白話音 koaⁿ，令人懷疑「一官」是否可以解釋為本文所討論的「某官」之頭銜。

35 感謝國立成功大學人事室協助確認黃典權教授之出生年。

36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臺灣省志班，〈榕園學記〉，《臺灣風物》24.2(1974.6): 71。黃典權祖籍南靖，出生、成長於漳州首府龍溪縣。

37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1959），頁 902-903。

38 讀作 kiela 時才有男同性戀者和做淫亂事的意義；讀作 kiedie 時則僅有拜把兄弟的含意。王振忠，〈契兄、契弟、契友、契父、契子〉，頁 172。

39 同上註，頁 166-178。

40 吳鳳斌、聶德寧、謝美華編纂，《雅加達華人婚姻：1772-1919 年吧城唐人成婚註冊簿》（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0）。

「官」。⁴¹

從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簡單將「官」的用法歸納為：

1. 稱呼地位較高的外人所用的敬稱，《廈門志》所說「呼有體面者曰官」，以及恭維人的套語「阿官阿舍」皆屬此類。
2. 稱呼家人晚輩時也可以使用「官」，這在閩南語戲文中有文獻可證，此文化亦有可能透過擬制血親的原理被挪用至海上的男同性戀關係。

不過以上兩種用法都是在庶民之間使用，當庶民面對士人階層的官員時，「某官」的稱呼就會被代以較為正式的名字。在嘉靖刊本《荔鏡記》第三十八齣〈詞告知州〉中，通常被稱作「林大官」的林大因為逼婚黃五娘不成狀告知州，在狀子上就寫上他的本名：

告狀人林大鼻，年三十四歲，係在坊民籍。狀告：縱奴姦家長女事。先年憑媒李大嫂用銀二百兩，送到坊民黃中志家，收准為聘禮……。⁴²

在狀詞中，除了林大的本名林大鼻，黃九郎的本名黃中志也被寫出來了。但林大可能不知來自泉州的外地人陳三本名為何，所以仍以陳三稱之。陳三的本名，到了第四十四齣〈知州判詞〉，也在供狀中出現了：

供狀人陳三，年二十歲，係泉州府，晉江縣，朋山嶺後官籍。因送哥嫂廣南，運使伯延是我親兄。歇在潮州驛內，因去賞燈閒行，遇見黃厝五娘，兩邊相看有情。……林大得知來告，差人力到公廳。萬望老爹明鏡，依律斷問分明。並無捏詞情意。伯卿是我正名。情願所供是實，畫號簽名（僉名）。⁴³

陳三是官家子弟，但還沒有得到功名，平常以陳三之名活動，親近的五娘和益春稱他「三哥」，可是到了正式的公堂面對知州「老爹」，陳三也必須供出他的正名。從《荔鏡記》的用法可知，「官」作為敬稱僅能在庶民階層中使用，進到社會地位較高的士人階層主導的領域時，例如公堂之上，身分較低的庶民就必須以本名（正名）被人認識。同樣的現象也出現在廣州行商的

41 就像現在男同志稱較有男性氣質者為「哥哥」，氣質陰柔者為「弟弟」，氣質陰柔的女同志稱為「婆」等等，都是挪用既有詞語的次文化用語。

42 吳守禮校註，《明嘉靖刊荔鏡記戲文校理》，頁 157。

43 同上註，頁 169。

習慣中，他們以「某官」聞名於外國商人之間，但面對官員時，這些商人都會改以本名入稟，表現出嚴格的士庶之別。

前文已經提過，「官」這個頭銜的分布不限於中國，它還被閩南海商帶到東亞各地，因此使用「官」這個頭銜的士庶之分在其他國家如何表現，就是個耐人尋味的問題。比較巴達維亞和長崎的資料，會發現閩南人在外國不是以政治地位維持士庶界線的區分，而是以文化歸屬決定。在巴達維亞的華人一般稱荷蘭東印度總督為「王」，⁴⁴ 往販長崎的海商也稱幕府派駐長崎的長崎奉行為「王」。但是與這兩地統治者溝通時，在巴達維亞的華人仍然經常以「某哥」、「某官」的名號被記入荷蘭檔案（當然是羅馬化拼音的形式）。可是在長崎，華商不僅稱唐通事為「老爹」，視通事為官員，致書長崎奉行時也大多以本名入稟。這樣的結果反映在長崎日人記錄下的民俗資料中有「某官」的稱呼，但在與日本官方往來的檔案中，卻很少看到以「某官」稱呼船主的紀錄。若有，也是以「觀」出現，比較接近《廈門志》所云「訛官為觀，遂多以觀為名者」的用法。⁴⁵

比較巴達維亞與長崎兩地與官員往來的作風，可知巴達維亞的華人並不把荷蘭統治官員視為士人階層，但是往販長崎的海商就明確地以對待士人階層的態度與長崎官員往來。語言和文化是說明兩地差異最好的解釋。華商在長崎用漢語漢文與唐通事直接互動，或透過唐通事老爹將漢文譯為日文與更高層官員溝通，都是在與本國相同的文化情境下行事，故可以（或必須）沿用本國的士庶之分。在巴達維亞的華人並非使用漢文與荷蘭統治機關溝

44 「王」只是俗稱，當地華人仍然知道荷蘭殖民地之政治制度。例如《開吧歷代史紀》中雖然也用「王」稱呼荷蘭東印度總督，但還是在〈開吧歷代王位表〉之首明確地以「和蘭王委在吧陵鎮守稱總督部堂」來稱呼巴達維亞的 *gouverneur general*。許雲樵校註，〈開吧歷代史紀〉，《南洋學報》（新加坡）9.1(1953): 13。不過在《公案簿》中音譯的「敖文律仁得嘮」更常出現。蘇爾夢，〈附錄：18-19 世紀印尼華文外的外來語初探〉，收錄於袁冰凌、（法）蘇爾夢校注，《公案簿》第 2 輯，頁 421。

45 記錄唐船請領信牌（1715 年實施正德新制後有信牌的唐船才准入港）的〈信牌方記錄〉（收錄 1715 至 1726 年的紀錄）中，船主的姓名以本名記錄，也有看到少數以「觀」結尾的人名。（日）大庭脩編，〈信牌方記錄〉，收錄於《享保時代の日中關係資料》第 1 冊（大阪：關西大學出版部，1986），頁 7-93。不過以「觀」為名者，有時本名也記錄在史料中。例如郭裕觀本名郭亨統。

通，即使有訴訟官司要請唐人甲必丹審斷，也僅「長揖不跪，自稱晚生」。⁴⁶由此可見巴達維亞華人社會中，並不把需要以外語溝通的荷蘭統治者視為士人階層，華人社群對內對外都用庶民階層的作風行事。地位最高的甲必丹（後來有更高的瑪腰，即荷語 *majoer* 之音譯），雖然因為被統治者授予管理唐人之權柄，但由甲必丹與民衆互動的儀式作風可知，甲必丹的行事仍屬庶民階層範疇，比較接近原鄉地方頭人扮演的角色，而非衙門裡的官老爺。而對社群之外的荷蘭統治者，華人也不被要求以本名入稟，所以留在荷蘭檔案中的人名經常以-*qua* 或-*gua* 的形式出現。從名號的使用來看，在巴達維亞並沒有華人在原鄉所認知由士人階層主導的領域。不論族群內外，所有的領域都是庶民的，可以用「官」敬稱他人。因此我們會在巴達維亞華人檔案中看到許多「呼有體面者曰官」的語例被記錄保存下來。

五、舍：官員和舉人親戚的專用頭銜

前節所討論的「官」，因為用法廣泛，可作敬稱可作小名，定義又不甚明確，所以必須從許多實際使用的語料來推敲其意義和用法。相較之下，史料中出現次數較少的「舍」，《廈英大辭典》給的定義就相當明確，是一個有特定身分的人才可以使用的稱呼（底線為筆者所加）：

sià affix to the names of men who have a senior relative a mandarin or kujin; in some places also applied to persons of the surname Tīⁿ, who are nearly related to the line of Tīⁿ Kok-sèng, i.e. Coxinga... hok-chiu hia, choân-chiu sià, ē-mîng kim-téng, at Fuchchau great numbers wear official boots; at Chinchew multitudes are styled “sià,” being relatives of mandarins or kujin; at Amoy gilt buttons on cap are very common.⁴⁷

46 清·王大海著，姚楠、吳琅璇校註，《海島逸誌》（香港：學津書店，1992），頁4。

47 Carstairs Douglas,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f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p. 425. 在1992年出版《閩南語考釋》的金門人洪乾祐回憶1940年代，光緒年間的福建舉人洪作舟的長子被人尊稱「洪大舍」，他自己也曾叫他「大舍伯」。這是說明「舍」的用法的典型實例。洪乾祐，《閩南語考釋》（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頁76。

要有尊親屬當官或有舉人的功名，才可以被加上「舍」的稱號，因此「舍」不像「官」是透過個人成就得到敬重而加上的頭銜，而是表示官蔭子弟的身分。鄉試舉人雖然不見得正式授官，但也已經具有經過大挑當官的資格，故可以將子弟與官蔭子弟視為有相同的家世背景，也可稱「舍」。由此可知，「舍」是透過社會關係得到的頭銜，與可以表達個人成就的「官」屬於不同範疇的用法，所以一個人不可能因為自己的努力而從「某官」升級為「某舍」。不過這也表示「官」和「舍」不是互斥的頭銜，所以如果在史料中看到有人一開始稱某官，後來稱某舍，我們不能用（已被證明錯誤的）戶等說，推論這個人從「官」升級為「舍」。正確的解讀為，這個人有親戚當上官員，或是考上舉人了。但是能夠當官或考取舉人的人本來就少，我們在史料中看到帶有「舍」之頭銜的人自然比「官」少很多。辭典的解釋往往反映理想狀態，故我們還是要檢查被稱為「舍」的人是否真的符合辭典所定義的身分。在目前所能得到的資料中，在廣州開設泰和行的顏亮洲（顏德舍）一族有清楚的世系可供檢驗。

十八世紀廣州洋行中，顏氏家族是在歐洲的貿易公司檔案中相當容易辨識的一群人，因為顏家主要洋行商人的商名（trade name）中都有「舍」。⁴⁸ 顏家並非一開始就加入廣州洋行貿易，但顏氏一族在 1734 年到 1780 年代間，長達半世紀的時間掌握了廣州對外貿易的主導權。開啓顏家在廣州洋行事業的人是顏德舍（Texia, Tucjshaw, Tiesja 等，他也用過「官」，在西文檔案上稱做 Tecqua, Tacquoa 等），從《重修顏氏遷粵家譜》可以找到顏家洋行商人的生平和譜名，顏德舍的譜名為亮洲，號綽亭。⁴⁹ 他的兒子瑞舍、瑛舍、琳舍的譜名分別為時瑞、時瑛、時琳。⁵⁰ 《重修顏氏遷粵家譜》的題名表示，顏氏是從外地遷到廣州的家族。顏亮洲的祖先本籍福建省泉州府晉江縣，第十一世顏廷濬（1614-1674）為避亂遷至廣州省城，與他一同逃難到廣州的子孫有時年三歲的十三世長孫顏建勳（1660-1722）。顏建勳於 1681 年考上康熙辛酉科鄉試舉人，結果六次會試不中，後來經過大挑授與陝西寧遠知縣。⁵¹

48 Paul A. Van Dyke, *Merchants of Canton and Macao*, p. 383.

49 《重修顏氏遷粵家譜》，光緒丁亥（1887）刻本，卷 2，頁 5。

50 《重修顏氏遷粵家譜》，卷 3，頁 51。

51 由顏建勳的年紀可推算顏家遷粵的時間在 1662 年，或許與同年實施的遷界令有關。

顏建勳以下還有四個弟弟，其中五弟顏建謀之子即是顏亮洲（1696-1751）。顏亮洲三歲時父親顏建謀早逝，而伯父顏建勳又遠在陝西寧遠，加上仕途不順，必須變賣家鄉財產來償還賠累，無力照顧姪子顏亮洲。年幼的顏亮洲由母親吳氏（也是寄籍廣州的泉州人）扶養教育，⁵²長大後依母之言娶同樣來自福建的柯氏次女為正室。⁵³顏亮洲最初也和伯父顏建勳一樣走上科第之途，曾經考取監生，但因為家裡經濟每況愈下，顏亮洲決定棄學從商，最後就從科舉的中輟者成為聞名海外的廣州鉅富顏德舍。最後顏亮洲在回泉州安平祭祖時，因長途跋涉在當地過世，年五十六歲。⁵⁴顏亮洲有十二子，其中顏瑞舍（有 Swetia, Suesia, Zwietsia 等拼寫）、顏瑛舍（有 Ingsia, Inksja, Ingshaw, Ynshaw 等拼寫）、顏琳舍（有 Limsia, Lamsia, Lunshaw, Lonesia 等拼寫）都繼承父業，成為活躍於廣州貿易的洋行商人。⁵⁵

顏亮洲雖然已經是顏家遷粵的第四世，生長都在廣州，但從婚姻對象來看，顏亮洲的家族網絡屬於寄籍廣州的福建人，遷粵顏家本身也維持返回泉州祭祖的習慣。由此可推測顏家雖然定居廣州，但家族內仍然保持閩南風俗，也會說閩南語。最直接證明顏亮洲閩南語能力的史料來自丁卯科廣東鄉試主考官李清芳。李清芳是泉州安溪人，為李光地從孫，1747 年為廣東丁卯科鄉試造訪廣州。試務結束後李清芳拜訪廣州西郊的洋行大商人顏亮洲，兩人「操閩音敘桑梓情，幾忘身在使槎」。⁵⁶這顯示遷粵顏氏一族在投入廣州洋行貿易時，仍然保有原鄉閩南文化和語言，稱「官」稱「舍」為風俗使然。加上顏亮洲的伯父顏建勳舉人出身，雖然官運多舛，連累後代，但畢竟還是仕宦之家。顏亮洲以降從事廣州洋行貿易的子孫，在文化和身分上都符合《廈門志》和《廈英大辭典》對「舍」的定義，因此他們以「某舍」的名號成為十八世紀廣州洋行貿易中相當容易辨識的一群人。可是遷粵顏家是生活在主流文化為粵語的廣州，或許怕子孫不知祖先「某舍」的名號表示他們為仕宦之家的

《重修顏氏遷粵家譜》，卷 2，頁 1。

52 《重修顏氏遷粵家譜》，卷 2，頁 3。

53 《重修顏氏遷粵家譜》，卷 2，頁 5。

54 《重修顏氏遷粵家譜》，卷 2，頁 92-93。

55 Paul A. Van Dyke, *Merchants of Canton and Macao*, pp. 355-383.

56 《重修顏氏遷粵家譜》，卷 2，頁 47。

光榮家世，顏亮洲的墓誌銘有如此記載：

公諱亮洲，字淇瞻，綽亭其別字也，德舍其小字也。閩族稱宦家子為舍，而冠之以乳名也。⁵⁷

有這條史料，即使今人未見《廈門志》或《廈英大辭典》對「舍」的解釋，應該也能了解這個頭銜在大福佬文化圈內有多顯赫的分量。

不過「舍」這個頭銜能夠用幾代，似乎沒有明確的上限。亦玄在《臺語溯源》提到「一代做官三代舍」這句俗語，⁵⁸但這裡的「三代舍」應該不是實際的數量，而是表示「多」的意思。《廈英大辭典》也提到鄭成功一族的後代也會稱「舍」，而鄭氏家族從鄭芝龍一官受招撫後成為官宦之家，到了十九世紀末葉早已超過三代。史料中被稱為「舍」的鄭氏家族成員，最年長的是鄭芝龍的四弟鄭芝豹，在《熱蘭遮城日誌》中被稱為 Sisia，顯然是「四舍」的譯音。鄭芝龍之子鄭成功小字森舍。⁵⁹鄭成功十子中，可以在史料中確認具有「舍」者有四人，分別是長子錦舍（鄭經）、⁶⁰次子聰舍（鄭聰）、六子寬舍（鄭寬）、⁶¹七子裕舍（鄭裕）。⁶²從命名的規律推測，其他六人應該也有「舍」的頭銜。再下一代，鄭經長子欽舍（鄭克塽），次子秦舍（鄭克塽）。⁶³鄭克塽以後的鄭氏子孫如何稱「舍」，目前資料難以說明，但從杜嘉德能在 1870 年代於廈門收集到相關語料，鄭成功後人應是將「舍」當作彰顯其家世的象徵，因為這一族至少從鄭芝龍就撫授官後就有足夠的資格稱「舍」。

57 《重修顏氏遷粵家譜》，卷 2，頁 95。

58 亦玄，《臺語溯源》（臺北：時報文化公司，1977），頁 32。

59 原題「偽鄭逸事」。清·郁永河，《裨海紀遊》（《臺灣文獻叢刊》第 44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頁 47。

60 清·郁永河，《裨海紀遊》，頁 50。

61 清·季麒光，《蓉洲詩文稿選輯·東寧政事集》（香港：香港人民出版社，2006），頁 166。

62 清·郁永河，《裨海紀遊》，頁 50。

63 清·郁永河，《裨海紀遊》，頁 52-53。依照〈石井本宗族譜〉，鄭經次子鄭克塽與其弟的乳名為秦、晉、周、楚、齊、蜀、商、岱、肅、遼。從次子秦到六子齊都可以對應到明太祖分封的諸藩王。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輯，〈石井本宗族譜〉，《鄭氏關係文書》，頁 42。

以上兩個案例都出現在大福佬文化圈的中國部分，有傳統九品十八級的官員，也有透過科舉得到的舉人身分，但在海外的巴達維亞，我們還是能見到冠之以「舍」的人名。前文討論「官」的意義時，我們已經知道在巴達維亞沒有需要尊稱「老爹」的官員，但是荷蘭殖民地也沒有科舉，那這些被稱為「舍」的人要如何得到這個頭銜？這個問題，只要把《開吧歷代史紀》中被稱為「舍」的人物與家世列出，答案就一目瞭然。以下人物依年代先後排序，方括號為筆者註解：

1. 陳忠舍〔Tan Tiongua〕，陳穆〔陳穆觀，1706-1726 任甲大〕之子，任〔雷珍蘭〕事十五年，後吧反，入禁中，卒焉。
2. 康政舍，康敬子，丁巳。
3. 林椿舍，明光〔Limbeengko，1742-1746 任甲大〕子，戊辰〔1748 任武直迷〕。
4. 唐偏舍〔Tung Pi-Enko，1775 年 12 月 19 日受命雷珍蘭〕，甲大唐思第三子。
5. 黃綿舍〔Oeij Biankong〕，任雷珍蘭八年，升甲大，自辛亥〔1791〕至庚申〔1800〕告老。
6. 陳永元舍，炳郎〔1808-1810 任甲大〕之子，自戊子〔1828〕至丁酉〔1837〕十月，加陞瑪腰銜，兼理甲大事。〔公案簿羅馬字簽名作 Tan Engoan〕
7. 黃燎光舍，前甲大綿舍之孫。〔公案簿羅馬字簽名作 Oeij Liauwkong〕⁶⁴

以上七位華人官員，除了康政舍和黃綿舍的家世不明，其他六位的父祖都當過管理華人之長的甲必丹。雖然當地華人並非以在中國原鄉面對官員的行儀面對甲必丹，但從甲必丹的子孫在當地社群被冠以「舍」的頭銜，可見在吧城唐人眼中，甲必丹也如同有品級的官員和有功名的人物。這種微妙又有點逾越常態的身分稱呼，是海外移民與異國政治制度接觸中有趣的現象。

64 許雲樵校註，〈開吧歷代史紀〉，《南洋學報》（新加坡）9.1(1953): 16-19。羅馬字姓名出自 B. Hoetink, "Chineesche officieren te Batavia onder de Compagnie," *Bijdragen tot de Taal-, Land- en Volkenkunde van Nederlandsch-Indië* 78.1(1922): 8-9; 78.2(1922): 88-95.

六、「官」源於宋代的身分特權

以上透過分析「官」與「舍」在十六到十九世紀文獻中出現的語料，筆者已從史料確定《廈門志》和《廈英大辭典》記載的說明無誤，並且運用語料補充《廈門志》和《廈英大辭典》沒有記載的用法，還原古代大福佬文化圈中「官」與「舍」這兩個頭銜的多元樣貌。但是《廈門志》和《廈英大辭典》並沒有說明「官」與「舍」的詞源，而經常被引用來解釋的明初戶等說，經檢查相關史料也沒有發現可以支持的證據。在沒有來自和「官」與「舍」的使用同時代的資料說明其詞源的情況下，我們還是要回到十六到十九世紀文獻，尋找這兩個頭銜在發展與使用的過程中所留下的痕跡。

在十七世紀以降的文獻中，我們看到使用「官」與「舍」的格式多為姓氏後帶有「某官」、「某舍」，後來也有姓名後加上「官」或「舍」的用法。前文引用過的十六世紀明嘉靖刊本《荔鏡記》中，戲文使用人物頭銜的方式比十七、十八世紀多元，可以反映這些頭銜早期的發展階段。但是嘉靖刊本《荔鏡記》中關於「官」的語料較多，故以下先討論「官」的詞源，「舍」的詞源還必須利用其他資料說明。

前文提及嘉靖刊本《荔鏡記》中，地方土豪林大被尊稱「林大官」，但也有稱其為「林官人」的說法。例如第二十二齣〈梳粧意懶〉中益春與五娘的對話：

（貼）爹媽生恁如花似錦，苦切乜事？

（旦）恨爹媽力阮主對林大鼻。

（貼）林官人伊人句有錢。

（旦）任伊錢銀平半天。

（貼）林大官伊人句有田地。

（旦）卜許田地卜做乜？你明知我心悶，即來說話弄我。⁶⁵

在這段戲文中，林大的三種稱呼都有出現，表示三者的用法可以互換。這幾個稱呼中，「林官人」的稱呼值得深究。「官人」一詞在嘉靖刊本《荔鏡記》中除了用於尊稱他人，也可以是普通名詞，用在妻子稱丈夫，或是奴婢

65 吳守禮校註，《明嘉靖刊荔鏡記戲文校理》，頁 90。

稱男主人的情況。作為普通名詞的「官人」，除了用作呼格（vocative），也可以和人名結合指稱不在場的第三人。第四十五齣〈收監送飯〉中就有益春稱呼男主人陳三的兩種用法：

（貼） 阮是後溝黃九郎舍，卜送飯乞阮官人食。

.....

（淨） 啞姊，你卜送飯度誰人食？

（貼） 阮送卜乞陳三官人食。⁶⁶

吳守禮指出，這種妻子稱丈夫，或是奴婢稱男主人「官人」的用法，在二十世紀的臺灣還能聽到，對他來說極為生動。⁶⁷ 洪乾祐在 1930、40 年代於金門的成長過程中，也聽到奴僕稱主人「阿官」。⁶⁸ 除了這些近人記憶中的語料之外，我們前面也已經從《荔鏡記》的用法知道，「官」和「官人」的用法有相當程度重疊：可以用在敬稱外人，也可以用在稱呼家人。

「官」和「官人」的兩種用法中，稱呼家人的用法應該較為晚起。就像現在華語中稱丈夫為「先生」一樣，最早是對士人的尊號，後來變成稱呼專業人士的用語，在二十世紀初擴大用法變成一般男子的稱呼，後來又滲入家庭用語變成妻子對他人稱自己丈夫的用語。「官人」可能也曾經過這種過程，並且從「官人」簡化為「官」。

再往更早的資料追溯，我們可以看到南宋的官員在江西樂安縣勸諭賑濟饑荒，一一點名縣內富戶時就用「官人」稱呼他們：

邑內風俗，當職雖未能周知，如出等稅家彰彰在人耳目者，已略得其槩。如詹良卿登仕，則甲於一邑四鄉者也；曾料院、許道州、詹季宏官人、曾正則官人、曾季同官人、詹明伯官人，皆邑內蓄米之多者（以下又提及 23 富戶，皆稱「官人」，從略）。⁶⁹

「曾料院」和「許道州」明顯是姓氏加官職名的尊稱，用法同《荔鏡記》

66 吳守禮校註，《明嘉靖刊荔鏡記戲文校理》，頁 173。

67 吳守禮校註，《明嘉靖刊荔鏡記戲文分類詞彙》（臺北：從宜工作室，2007），頁 70。

68 洪乾祐，《閩南語考釋》，頁 75。

69 南宋·黃震，〈四月十九日勸樂安縣稅戶發糶榜〉，《黃氏日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70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卷 78，頁 16-17。不過稱「官人」的人數眾多，似乎也指上等戶。

中稱陳三之兄爲「陳運使」，而陳三本人也自稱屬於官籍。榜論中其他以姓名加「官人」稱呼的人，或許是具官籍但沒有實授職缺的人。學者認爲，這篇榜論中提及的人物屬於南宋鄉村中的特權階級「官戶」，是農村中最上層的階層。⁷⁰ 官戶擁有免除差役和稅賦的特權，不只容易累積田產，也因此出現民戶「詭名挾佃」，將田產寄託給官戶以規避賦稅的方法。⁷¹ 爲避免官戶累積太多免稅土地，北宋末徽宗政和年間（1111-1118）設定免稅額上限，南宋初年甚至一度廢止官戶免稅特權，僅能免役，後來雖恢復免稅特權，但額度只有北宋規定的一半。⁷² 雖然南宋時官戶的特權被削減，但免稅免役的特權使官戶成爲值得爭取的地位，因此官戶與需要透過詭名挾戶降低戶等的民戶不同，可以大方地在頭銜上冠以「官人」表示其社會地位。由此推測，宋代「官人」的頭銜到明清發展成男子尊稱頭銜「官」，後來也成爲在家中稱呼丈夫和男主人的用語。

不過在往古代追溯「官」的詞源時，我們難以忽略「某官」的稱呼在初唐就已經出現。例如王勃所作〈夏日宴張二林亭序〉中稱張林亭爲「張二官」。⁷³ 駱賓王在詩序〈秋夜送閻五還潤州〉稱閻五「閻五官」，〈秋日送尹大赴京〉稱尹大「尹大官」。⁷⁴ 這些唐代的語料和明清閩南語中的用法相符，是否可用來說明閩南語的「官」其實是唐代遺風呢？對此本文持較爲保留的態度。一來王勃和駱賓王都是在黃河流域活動的文人，與福建有相當距離。雖然有陳元光從河南固始帶部衆平閩開漳的說法，但若要以陳元光部衆作爲閩南語「官」的詞源，我們就必須去評估陳元光所帶來的中原文化對閩南的影響程度，而這個問題至今仍未有可靠的解答。再者，從前文已討論過的歷史文獻可知，從唐代到明清，中間還有一個「官」與「官人」共時使用的年代。

70 梁庚堯，《南宋的農村經濟》（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4），頁 42。

71 王曾瑜，〈宋代的詭名挾戶（上）〉，《社會科學研究》1986.4(1986.8): 78。

72 梁庚堯，《南宋的農村經濟》，頁 112-113。

73 唐·王勃，《王子安集》（《四部叢刊正編》第 31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上海涵芬樓借江南圖書館藏明張紹和刊本），卷 6，頁 6-7。張紹和即張變，漳州龍溪人，著有《東西洋考》，理應對閩南語頭銜「官」相當熟悉，但他並沒有對王勃使用的「官」表示意見。

74 唐·駱賓王，《駱賓王文集》（《四部叢刊正編》第 31 冊，景印上海涵芬樓藏明翻元刊本），頁 35、36。

例如本文多次引用的《荔鏡記》，背景設定在宋代，戲文中「官」與「官人」皆有出現。這個時代背景也同時是南宋官員以「官人」稱呼邑中富戶的時代。如果我們直接將明清的頭銜「官」與唐代的用法連結，我們就無法解釋「官」和「官人」在文獻中交互出現的現象。因此，筆者在此仍視宋代對男子之敬稱「官人」，為後來閩南語頭銜「官」的直接詞源。

七、「舍」源於宋代太學三舍法

以上討論將「官」的直接詞源定於宋代的身分制度，接下來要處理「舍」的詞源。前文已經提過，許多鄭成功家族的後代會用「舍」這個頭銜來彰顯其家世，所以「舍」的詞源在鄭成功相關研究就已有學者嘗試解釋。1931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景印在福建發現的《延平王戶官楊英從征實錄》抄本時，朱希祖為之作長序，提及本書有許多福建方言用語，例如稱官家子為「舍」，如鄭成功二弟「渡舍」，朱希祖猜測「舍」是「少爺」的縮音。⁷⁵此說後來被採進《臺灣文獻叢刊》的排印本。⁷⁶不過這本書的另一份手抄本1961年在南安石井鄉發現，廈門大學陳碧筌以此新發現抄本與史語所景印本對照，校出許多影印本脫漏的字，同時參照其他史料進行新版本的校注。在此陳碧筌引用〈南贛巡撫佟國器密揭帖〉中，鄭家家僕稱鄭芝龍之女「婉舍」，推測「舍」也可以是「小姐」的縮音。⁷⁷

朱希祖和陳碧筌的推測可以用嘉靖刊本《荔鏡記》來檢證。在嘉靖刊本《荔鏡記》第十九齣〈打破寶鏡〉中，陳三偽裝成磨鏡客拜訪黃府時，與婢女益春初次見面時稱她「小姐」，而婢女益春當然不是官員之後，不合「舍」的意義。再者，黃九郎在鄉里的身分是糧長，糧長一職始自明初洪武年間，從民戶中找稅糧較多、資金充裕的富戶充任。⁷⁸糧長的身分和林大狀告知州時

75 朱希祖，〈延平王戶官楊英從征實錄序〉，收錄於《延平王戶官楊英從征實錄》（北平：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31）。

76 明鄭·楊英，《從征實錄》（《臺灣文獻叢刊》第32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頁56。

77 明鄭·楊英著，陳碧筌校注，《先王實錄校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頁81。

78 梁方仲，《明代糧長制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頁10。雖然從「知州」、

所稱「坊民黃九郎」兩個證據，可知黃九郎屬於民戶，他的子女並沒有被稱為「舍」的資格。其實在《荔鏡記》的主要角色中，能夠被稱為「舍」的男性只有陳三這位官蔭仔兒。但是從第三十二齣〈赤水收租〉中佃戶尊稱他為「泉州三爹」和「泉州三機宜」，而非「泉州三少爺」，可知「少爺」在古代閩南語中不是常用語。因此，朱希祖和陳碧笙的推測雖然看似有理，但並不被已知語料支持，只能算是猜得不差、但最終失準的俗民詞源（folk etymology）。

在閩南語和臺語研究的領域，則有亦玄和洪乾祐兩位學者認為閩南語的「舍」來自古代官名「舍人」。洪乾祐從明代白話小說中舉出例證，說明作為官職名的「舍人」在明清時已經成為民間使用的敬稱。⁷⁹ 不過檢查洪乾祐提出的例子，從語氣來看並不像是真心誠意的敬稱，反而比較像現代使用「阿舍」的用法，帶有輕蔑的語氣。而且白話小說中的構詞是「姓氏」加上「舍」，例如「湯舍」、「胡舍」，這和閩南語「行次或名」加上「舍」的構詞習慣不一樣。這些白話小說成書於十六、十七世紀的江南，所以洪乾祐所舉例的「舍」應該比較接近十七世紀《土風錄》所記「呼下等人曰某舍」，屬於中國江南一帶的用法。⁸⁰ 《土風錄》在「某舍」的標題下有註曰「舍作沙去聲」，可見「舍」只是當時江南俗語的表記而已。既然構詞和用法都不同，用白話小說的「舍」來說明閩南語的「舍」，其實只是望文生義的解釋而已。年代較早的亦玄同樣認為「舍」來自「舍人」，並舉出明代衛所制度之下，軍衛的應襲子弟稱為「舍人」作為例證。⁸¹ 的確，《大明會典》中稱軍衛子弟為「舍人」和「軍餘」，但如果考慮到衛所制的官兵經常調動，社會地位也不高，軍籍的「舍人」要如何變成民間普遍令人敬重的「舍」，則不無疑問。事實上，明代衛所之中通行的語言通常帶有官話或原鄉成分，文化上無法歸屬於特定地區，往往形成方言島，現在則被語言學者統稱為「軍話」。⁸² 但是「官」和「舍」都是屬於

「轉運使」等官名可知《荔鏡記》的背景設定在宋代，但新刊本中加入當代元素在戲曲小說中也是常見之事。

79 洪乾祐，《閩南語考釋》，頁 75。

80 清·顧張思，《土風錄》，（日）長澤規矩也編，《明清俗語辭書集成》第 3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卷 17，頁 369。

81 亦玄，《臺語溯源》，頁 32-34。

82 黃曉東，〈漢語軍話概述〉，《語言教學與研究》2007.3(2007.5): 21-22。

閩南特色的敬稱，從文化圈的角度來看，亦玄和洪乾祐兩位學者提出的看法，要作為閩南語敬稱「舍」的詞源，仍有困難。

其實「舍」只能用在稱呼官家子弟或舉人之後的用法，本身已經提供足夠的線索。1071年北宋王安石變法時開始實施「太學三舍法」，將太學分為外舍、內舍、上舍三個等級，每舍的名額往上級遞減，上舍畢業後即可授官。這個制度在靖康之難宋室南渡後繼續在南宋實施，但在華北則中斷。南宋太學的入學應試資格，常態性的有三種，分別是：品官子弟及俊異庶人、州學升貢、貢舉落第。⁸³ 品官子弟這項資格與閩南語中使用「舍」的資格相當。再者，進入太學後的學生要經過外舍、內舍、上舍的升級考核過程，其中後兩舍可能因為表示通過考核後才能取得的資格，所以會被士人用作頭銜來稱呼太學生。明代國子監制度中雖然沒有外舍、內舍、上舍的名義，但從最低等的正義、崇志、廣業三堂，中等的修道、誠心二堂，最後到最高等的率性堂，如此配置的原型正是宋代太學三舍法。⁸⁴ 在前文所提及的鄭芝龍家族語例中，「四舍」⁸⁵ 鄭芝豹和「森舍」鄭成功都曾經入國子監為太學生，完全符合襲蔭而稱「舍」的社會地位。

但是「上舍」或「內舍」的頭銜會簡化為「舍」的時間點卻早得多，至少在元代就已經出現這樣的用法。例如《青樓集》提及散曲作家劉廷信時，旁人如是稱呼：

時有劉廷信者，南臺御史劉廷翰之族弟。俗呼曰黑劉五，落魄不羈。工於笑談，天性聰慧至於詞章，信口成句，而街市俚近之談。變用新奇，能道人所不能道者，與馬氏各相聞而未識。一日相遇於道，偕行者曰：「二人請相見。」曰：「此劉五舍也，此即馬般般醜也。」⁸⁶

成書於十七世紀的《醒世姻緣傳》中，冒頭出現的主角晁源，也有「上舍」和「大舍」兩種稱呼，顯見當時「舍」的稱呼除了是士人階級互相使用

83 王建秋，〈宋代太學的應試資格〉，《大陸雜誌》24.12(1962.6): 20。

84 林麗月，《明代的國子監生》（臺北：東吳大學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78），頁21。

85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輯，〈石井本宗族譜〉，《鄭氏關係文書》，頁37。

86 元·夏庭芝著，孫崇濤、徐宏圖箋注，《青樓集箋注》（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0），頁211-212。

的稱呼，也和「官」一樣與行次結合，成為「某舍」的構詞，並且滲透到庶民階級，成為稱呼官宦子弟常用的口語：

當初山東武城縣有一個上舍，姓晁名源，其父是個名士，名字叫做晁思孝……晁秀才連科不中，剛剛挨得歲貢出門……手頭也漸從容。隨與晁源娶了計處士的女兒計氏為妻。……武城縣這些勢利小人聽見晁秀才選了知縣，又得了天下第一個美缺，恨不得將晁大舍的卵脬扯將出來，大家扛在肩上；又恨不得晁大舍的屁股掀將起來，大家舔他糞門。⁸⁷

不過《醒世姻緣傳》的語例還是給我們一個未解的問題。如果在《醒世姻緣傳》成書的十七世紀上半葉，中國其他地方還有用「舍」敬稱人的習慣，為什麼十七世紀末的郁永河會說「閩俗父為官，其子皆得稱舍」，⁸⁸將這個頭銜特別稱為「閩俗」呢？這是目前未解的問題。是「舍」作為敬稱的習慣在中國其他地方迅速沒落，或是報導者的見聞有限？比較現代學者早期對「官」與「舍」的錯誤見解，郁永河或許不是唯一受限於見聞而誤判的人。

八、結 語

「官」與「舍」的意義和詞源作為一個解讀史料上的小問題，從二十世紀初開始引發現代研究者注目後，先後有學者表示疑問或試圖提出解釋。但早期研究中最有名的「戶等說」，經本文核對史料後發現其說沒有史料證據支持，僅是十六、十七世紀的文人照錄傳聞的結果，不足為信。本研究把「官」與「舍」的意義和詞源放在大福佬文化圈中研究，並廣泛收集十七至十九世紀閩南人足跡所到之處所留下的史料，逐漸將「官」與「舍」的意義釐清，確定《廈門志》和《廈英大辭典》的記載準確，並補充二書中沒有說清楚的細節。至於「官」與「舍」的詞源，本文提出與前人不同的新解。「官」是宋代對官家人士之尊稱「官人」的簡化形式。「舍」這個頭銜過去也有學者從直觀的「縮音」來解釋，但從史料上看，他們的推測只是俗民詞源（folk etymology），並不可信。但是用「舍」這個詞的使用條件作為線索，本文認

87 清·西周生，《醒世姻緣》第1冊（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6），頁2-4。

88 清·郁永河，《裨海紀遊》，頁47。

爲宋代實施的太學三舍法才是「舍」這個頭銜的源頭。相較於前人對「官」與「舍」的解釋，本研究是建立在學界過去數十年間整理發掘的史料之上，並且採取大福佬文化圈的史觀來解釋詞義和辨識詞源。但筆者也不敢自認本文的論點可當作最終結論，未來有更多史料、語料拓展我們對古代閩南語的掌握後，「官」與「舍」這兩個困擾學界數十年的頭銜，或許還會有更多元的面貌等待被重新發掘、記錄。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唐·王勃，《王子安集》，《四部叢刊正編》第31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上海涵芬樓借江南圖書館藏明張紹和刊本。

唐·駱賓王，《駱賓王文集》，《四部叢刊正編》第31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上海涵芬樓藏明翻元刊本。

南宋·黃震，《黃氏日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08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元·夏庭芝著，孫崇濤、徐宏圖箋注，《青樓集箋注》，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0。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1959。

明·李東陽等撰，申時行等修，《大明會典》，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景印萬曆刊本，1976。

明·田藝蘅，《留青日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明鄭·楊英，《從征實錄》，《臺灣文獻叢刊》第32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

明鄭·楊英著，陳碧笙校注，《先王實錄校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

清·西周生，《醒世姻緣》第1冊，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6。

清·郁永河，《裨海紀遊》，《臺灣文獻叢刊》第44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

清·周凱，《廈門志》，《臺灣文獻叢刊》第95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

清·高士奇，《天祿識餘》，《叢書集成續編》第215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說鈴本，1989。

清·顧張思，《土風錄》，收錄於（日）長澤規矩也編，《明清俗語辭書集成》第3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清·王大海著，姚楠、吳琅璇校註，《海島逸誌》，香港：學津書店，1992。
- 清·季麒光，《蓉洲詩文稿選輯·東寧政事集》，香港：香港人民出版社，2006。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輯，《鄭氏關係文書》，《臺灣文獻叢刊》第 69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
- 《重修顏氏遷粵家譜》，光緒丁亥（1887）刻本。
- （日）大庭脩編，〈信牌方記錄〉，收錄於《享保時代の日中關係資料》第 1 冊，大阪：關西大學出版部，1986，頁 7-93。
- （日）中川忠英著，孫伯醇、（日）村松一彌編，《清俗紀聞》，東京：平凡社，影印寬政年間刻本，1982。
- （日）古典研究會編，（日）長澤規矩也解題，《唐話辭書類集》第 4 集，東京：汲古書院，1971。

“Jargon Spoken at Canton.” *The Chinese Repository* 4(1836.1): 428-435.

二、近人論著

- 王建秋 1962 〈宋代太學的應試資格〉，《大陸雜誌》24.12(1962.6): 20-29。
- 王振忠 2000 〈契兄、契弟、契友、契父、契子——《孫八救人得福》的歷史民俗背景解讀〉，《漢學研究》18.1(2000.6): 163-185。
- 王曾瑜 1986 〈宋代的詭名挾戶（上）〉，《社會科學研究》（成都）1986.4(1986.8): 77-81。
- 亦 玄 1977 《臺語溯源》，臺北：時報文化公司。
- 朱希祖 1931 〈延平王戶官楊英從征實錄序〉，收錄於《延平王戶官楊英從征實錄》，北平：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吳守禮校註 2001 《明嘉靖刊荔鏡記戲文校理》，臺北：從宜工作室。
- 吳守禮校註 2002 《明萬曆刊蘇六娘戲文校理》，臺北：從宜工作室。
- 吳守禮校註 2007 《明嘉靖刊荔鏡記戲文分類詞彙》，臺北：從宜工作室。
- 吳鳳斌、聶德寧、謝美華編纂 2010 《雅加達華人婚姻：1772-1919 年吧城唐人成婚註冊簿》，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 （日）岸本美緒 2012 〈明清時代の身分感覺〉，收錄於《風俗と時代観：明清史論集 1》，東京：研文出版，頁 147-178。
- 林麗月 1978 《明代的國子監生》，臺北：東吳大學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
- 洪乾祐 1992 《閩南語考釋》，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 翁佳音 2006 〈「牽手 khan-chhiu」來看臺灣世界史：從臺灣歷史慣用語論大福佬文化圈概念〉，《臺灣史研究》13.2(2006.12): 1-31。
- 翁建道 2009 〈北宋機宜文字官初探〉，《史學彙刊》24(2009.12): 1-36。

- 袁冰凌、(法)蘇爾夢(Claudine Salmon)校注 2004 《公案簿》第2輯,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臺灣省志班 1974 〈榕園學記〉,《臺灣風物》24.2(1974.6): 68-81。
- 梁方仲 1957 《明代糧長制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梁庚堯 1984 《南宋的農村經濟》,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 梁嘉彬 1937 《廣東十三行考》,上海:商務印書館。
- 許雲樵校註 1953 〈開吧歷代史紀〉,《南洋學報》(新加坡)9.1: 1-63。
- 陳荊和、陳育崧編著 1970 《新加坡華文碑銘集錄》,香港:香港中文大學。
- 黃曉東 2007 〈漢語軍話概述〉,《語言教學與研究》2007.3(2007.5): 21-27。
- 聶德寧、侯貞平、(荷)包樂史(Leonard Blussé)、吳鳳斌校注 2004 《公案簿》第3輯,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 (法)蘇爾夢(Claudine Salmon) 2004 〈附錄:18-19世紀印尼華文外的外來語初探〉,收錄於袁冰凌、蘇爾夢校注,《公案簿》第2輯,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頁417-438。
- 樂成顯 1998 《明代黃冊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Barclay, Thomas. 1923. *Supplement to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f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 Bolton, Kingsley. 2003. *Chinese Englishes: A Sociolinguistic Histor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heong, Weng Eang. 1997. *Hong Merchants of Canton: Chinese Merchants in Sino-Western Trade, 1684-1798*. Surrey: Curzon.
- Cordier, Henri. 1902. "Les marchands hanistes de Canton" *T'oung-pao*, 2nd series 3.5: 281-315.
- Douglas, Carstairs. 1873.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f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With the Principal Variations of the Chang-chew and Chin-chew Dialects*. London: Trubner & Co.
- Hoetink, B. 1922. "Chineesche officieren te Batavia onder de Compagnie." *Bijdragen tot de Taal-, Land- en Volkenkunde van Nederlandsch-Indië* 78.1: 8-9; 78.2: 88-95.
- Morse, H. B. 1926.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Oxford, UK: The Clarendon Press.
- Van Dyke, Paul A. 2011. *Merchants of Canton and Macao: Politics and Strategie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Trad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Honorific Suffixes of Hokkien Gentlemen: The Meanings, Usages and Etymologies of *-qua* and *-sia*

Chien Hung-yi*

Abstract

Reading maritime materials from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we usually encounter names with *-qua* 官 and *-sia* 舍 suffixes. These distinctive honorific suffixes belonged to Hokkien merchants who played a significant part in East Asian maritime trade. However, the meanings, usages, and etymologies of these suffixes have not yet been comprehensively clarified. This study first critiques the existing theory proposed by Liang Chia-pin in the 1930s, tracing it from the mid-Ming to the early 20th century, while pointing out its existing flaws and logical inconsistencies. I am unable to find verification for the evidence offered by Liang in support of his theory in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They are merely folk stories without historical basis and cannot explain the usages of *-qua* and *-sia*. I believe that the *Xiamen zhi* 廈門志 (Xiamen Gazetteer) and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offer the correct meanings and usages of these honorific suffixes: *-qua* is applicable to all gentlemen, but *-sia* is exclusive to the relatives of mandarins. I have found much supporting evidence for this in Hokkien-language materials, such as scripts, land deeds, merchants' trade names, and Chinese records from Batavia (Jakarta), etc. Based upon the usages of these suffixes, I also trace their etymologies to the Song dynasty, and try to explain their diachronic changes using historical evidence.

Keywords: honorific suffixes, *-qua* 官, *-sia* 舍, trading company names, etymology, greater-Hokkien cultural sphere

* Chien Hung-yi is a Ph.D. candidate in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at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